

---

# 抗战时期浙、闽、赣三省 新闻出版业述论

毛 策

---

抗战 8 年,浙、闽、赣东南三省的新闻工作者和文化出版工作者置身于抗敌前哨,经受了严峻的考验,为繁荣东南抗战文化作出了卓越贡献。

据不完全统计,东南三省在 8 年间创办各类报刊近百种,期刊 1000 余种,这还不包括各种群众文化团体创办的油印报刊在内。其中浙江省报刊发行数字有史料可凭。浙江省战时教育文化事业委员会、浙江省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浙江省图书杂志审查处曾分别于 1938 年、1939 年、1940 年、1943 年和 1945 年统计过该省报刊发行情况如下表:

类 别	1938 年	1939 年	1940 年	1943 年	1945 年	总 数
综合类	80	94	64	17	19	274
业务类	11	12	20	6	9	58
专门类	17	13	21	6	8	65
文艺类	1	4	4	4	2	15
通俗类	28	27	19	4	6	84
公报类	0	1	3	0	3	7
学校类	19	14	13	1	2	49

---

据浙江出版史志编辑组编《浙江出版史料》第 2 辑有关史料统计。

上表所列报刊种类及数字,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它在我国新闻史上也是前所未有的。战时东南地区的新闻工作者积极投身抗战,为唤起民众而贡献一切力量的可贵的民族精神十分令人感佩。战争破坏了一切,战时物质匮乏,办一张报纸或一个通讯社,比平时不知要难上几倍,特别是战争形势的紧张,使报人们常常处于播迁流徙之中,生活和生命安全得不到保障,时时处处面临着严峻考验。宦乡主持笔政的第三战区机关报《前线日报》,就曾四度搬迁。在如此频繁的搬迁之中,报社员工颠沛流离,苦不堪言,又因“生活陷于困顿,加之当时疟疾流行,疫病蔓延,缺医少药,痛苦万状”。此类遭遇,当然不独《前线日报》,在那种战争环境中,多数报纸都有这种经历。王造时主持的《前方日报》,在敌寇有进犯吉安之兆,军政大员纷纷撤离的情况下,仍坚守新闻阵地,坚持出版呼吁抵抗,充分表现了我国新闻工作者的勇气与胆识。正是由于东南地区的新闻工作具有那种“铁肩担道义”的使命感与责任感,才使他们置艰险于不顾,置生死于度外,运用新闻武器有效地服务于抗战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

## 一 战时新闻传媒的网络结构及其特征

战时东南地区的新闻发达景观,首先表现为新闻传播媒介呈网状形态。报纸、刊物、通讯社等新闻传媒犬牙交错,纵横密布于东南诸省各地,形成颇具规模的新闻网络结构。这种景观,比照以往新闻传媒的单一分布状况,都显得不同寻常。

抗战是一场全民族、全民众参与的伟大事业,新闻事业也应当是面向大众并由大众共同参与的事业。随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国民政府的新闻观念与新闻政策有所改变,一个相对宽松的新闻环境终于出现。虽然其间仍有曲折,特别是国民党坚持“一党

---

叶家怡:《我所知道的 前线日报》,载《江西文史资料选辑》第21辑。

专政’的立场并没有根本改变,因而在新闻领域里呈单向型辐射状态的新闻传播方式仍起着重要作用;但毕竟迫于形势,在一段时间里,在一个特定区域内,官方独家控制新闻的格局终被打破,新闻传媒的多层次展开、多向度流布的状况也终于得以形成。战时东南新闻界突破了以往的单一新闻格局,强化了民众对于新闻的参与意识,造成了新闻传媒的网络结构分布,便标志着战时新闻业的一种重要进展。概括言之,战时东南新闻业的网络结构形态具有下述特征:

一是以中心带动全面,将新闻传媒触角伸展到该地的广泛区域,形成了报纸、刊物、通讯社遍布于东南三省各地的新闻网络结构。如在金华——丽水文化中心内,曾先后创办、发行过《东南日报》《浙江日报》《正报》《国民新闻》《抗卫报》《中国儿童时报》等,又创办进步新闻通讯社国际通讯社金华分社、国际新闻社金华分社及春秋通讯社等。这类报纸和通讯社,对浙江乃至整个东南地区都产生了影响,不但为各地提供了新闻信息,也为各地新闻活动的开展作出了示范。在中心带动下,浙江各地报刊大量涌现,较著者就有浙西的《民族日报》《浙西导报》,浙东的《新浙东派》《青年日报》,浙南的《浙甌日报》《平报》等,至于短暂出现的小报和油印报纸,更是数不胜数。在上饶——赣州文化中心内,影响较大的报纸是上饶的《前线日报》,赣州的《正气日报》和吉安的《前方日报》等。在大报推动下,江西各地纷纷办起报纸,较有影响的就有《宁都日报》《大众日报》《捷报》《华光日报》《新闻日报》《华中日报》《工商报》《明耻日报》《抗战日报》《大江日报》《大同日报》《民锋日报》等。仅《民国日报》一种,就有《赣南民国日报》《赣北民国日报》《赣东民国日报》《赣西民国日报》。据统计,战时江西全省有报纸 61 种,这个并不精确的统计数字已足可显示其报纸的密布状况。在永安——南平文化中心内,仅永安一地就有《中

---

程其恒:《江西新闻事业概览》,引自《江西文史资料选辑》第 21 辑。

央日报》(福建版)、《福建日报》(永安版)、《大成日报》《民主报》《建设导报》《东南日报》(南平版)、《福建民报》《联合周报》《老百姓》《长风报》《民权报》《正义日报》《人报》《中国儿童时报》等 10 余种;此外,在崇安、建阳、建瓯、长汀等崇山峻岭中的小县城也都办有报纸,同样呈现战时福建新闻传媒的网状分布状况。由于各种文化团体和文化力量在办新闻中起了重要作用,打破了以往官方独家控制新闻的单一格局,遂使战时东南地区的新闻业呈空前发达景观。

二是拓展了办报者层面。由各个阶层、各种社会力量参与新闻事业,形成了新闻传媒的多层次展开和多向度流布的网络结构形态。战时东南地区新闻界,主要由官方、军方、民间 3 个层次构成,属官方的,包括国民党中央和 3 省地方政府主办的报纸,如《中央日报》(福建版)、浙江的《浙江日报》《浙江政治》《社教通讯》《碧湖》《调整》等;福建的《福建日报》《建设导报》《自治通讯》《福建妇女》等;江西的《民国日报》《正气日报》《特教通讯》等。另如浙江的《东南日报》福建的《认识》江西的《大众日报》等,虽未标明为政府主办,但报社大权由国民党人士操纵,秉承的仍是官方意志,也可纳入官方报纸范围。属军方的,主要是第三战区主办的报纸,如《前线日报》《政治前线》《抗敌报》等。民间报刊包括的范围相当广泛,政治色彩也很驳杂,有的同政府机构保持一定联系,有的为文化团体所创办,有的纯属个人办报。举凡抗敌后援会、青年服务团、儿童保育会、妇女救国会、教文会、自卫会、政工队等所办报刊,都可纳入这一系列。中共领导的文化机构和抗日根据地创办的报纸,集中体现了人民的意志,也应归属民间系列。在以上 3 个层次中,官方、军方办报不受节制,且有充裕的物质条件,故仍占有优势,大型报纸大抵控制在官方手中。但抗战期间民间文化团体大量涌现,进步文化人士的办报积极性很高,民间报刊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上都不可小觑。抗战 8 年间,仅金华一地,众多的抗日团体如抗战读书会、台湾义勇队、文化界救亡协会、军人服务队、木刻协

会、剧人协会等就创办了《战时生活》《台湾先锋》《新中国》《东方周刊》《文化战士》《东南儿童》《刀与笔》等 20 余种报刊。据《浙江省战时出版杂志目录》记载,抗战期间浙江省有期刊近 500 种,其中大多为地方组织和群众团体所办。由于新闻业呈现多层次展开的趋向,各种报刊传递来自不同阶层的信息,发自各阶层的呼声与要求,特别是民间报刊充当了民意集中与协调的角色,使新闻的调节机制得到了充分施展的机会。战时东南新闻界在多层次的网络结构中,就产生了多报刊同声相求、同气相应的新闻舆论效应,每有重大事件发生,三省报刊群起报道和评论,发出来自各阶级、各阶层的声音,形成强大的新闻舆论力量。如 1938 年底汪精卫叛国附敌的消息刚传出,便在东南新闻界迅速传播,各报不约而同群起声讨,大小报刊均出版“讨汪特辑”或“讨汪专号”,充分显示了新闻舆论在联手抗敌中所起的作用。

三是新闻界人士的频繁流动,加强了东南新闻界的密切交往,使这个新闻网络的联系更趋紧密。在整个抗战期间,许多著名报界人士曾先后活跃于浙、闽、赣三省。其中如范长江、曹聚仁、羊枣、石西民等新闻界翘楚人物,或多年服务于三省报界,或穿梭往返于三省新闻界,为东南地区战时新闻业的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曹聚仁于抗战初期曾作为战地记者深入淞沪、徐州等战争前线采访,其后又穿梭来往于东南三省,不但一度主持《前线日报》《正气日报》,还为《东南日报》撰写了颇多的通讯、消息,迅速、及时报道抗战信息,又到过福州、永安等地,对沟通三省新闻界起了重要作用。范长江、石西民等著名进步记者,曾在金华、南昌等地从事新闻活动,虽然在该地停留的时间并不长,但长期同三省报界保持密切联系,经常为该地报纸提供新闻和言论稿件,特别是他们领导的国际新闻社为东南各报提供大量国内外新闻,有力地促进了东南新闻业的

---

详见《浙江出版史料》第 2 期。该目录为 1945 年国民党浙江省政府图书杂志审查处编印的油印本。

繁盛。福建的著名新闻记者赵家欣，也是战时东南新闻界较活跃的一个，他初任厦门《星光日报》战地记者，曾赴台儿庄采访，写下长篇通讯《台儿庄血战记》；后又任香港《星岛日报》国内特派记者，在闽、浙、赣东战场采访战时新闻，又一度在江西《前线日报》等报服务，其中又集中精力在福建永安办报，其稿件则散见于东南三省报刊，对促进东南新闻界的广泛联络也是起过重要作用的。除职业新闻人士外，许多作家、学者投入报业，形成战时东南新闻界的一大特色。他们大都同社会各界保持密切联系，以自己的专业知识服务于新闻业，拓展了办报路子。如羊枣以军事问题专家主持《民主报》和《国际时事研究》，使这两份报刊在时事评论上独辟蹊径。羊枣在东南地区的知名度与号召力，对促进东南各报的联系产生深刻影响。又如严北溟以经济学家主持《浙江潮》《浙江日报》，宦乡以国际问题专家主持《前方日报》，王造时以社会学家主持《前方日报》，都使各报显示出自己的特色，在东南报界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 二 战争新闻的时效性与鼓动性

战争瞬息万变，注重新闻的时效性与鼓动性，乃是抗战宣传舆论导向的至关重要的功能要求。战时东南大小报刊上，新闻占据了大多数版面。

从战事新闻的报道看，新闻的功能特点尤为鲜明。几乎是每张报纸都以重要的版面向民众报告战情。《东南日报》因战争新闻的时效性强而闻名报界。战初，该报即抓住机遇，分派战地记者深入前线，直接在战场上截取战讯。新闻巨子曹聚仁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尤其是在1938年4月7日，他率先在《东南日报》刊出了轰动中外的“台儿庄大捷”的消息，使这种抢头条要闻的“火线办报”方式得以认可。《东南日报》《前线日报》为提高新闻的时效，均自设电台，直接收录路透社、哈瓦斯社、合众社等外电电讯，以弥补中央社电讯之不足。《前线日报》总编辑宦乡英语熟练，主笔时除接收中

央社电讯和联络一些电台电讯外，常接收外国广播新闻，增强战事新闻的时效。他的新闻报道速度快，走在东南各报前头。如日军偷袭珍珠港、美军攻克琉璜岛、罗斯福逝世、苏联对日宣战等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重大新闻都比国内的一般报纸早一日见报。宦乡的军事报道和预测还时常被第三战区长官部作为决策参谋之用。

这些报告战况的新闻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即大多报道战争的胜利消息。《东南日报》1938年11月22日至29日，以十分显眼的概括性标题和重要位置，报道了湘、鄂、豫、皖的战争进程，其标题为：“洞庭湖倭寇陷入困境，皂市收复修河畔”、“鄂豫我反攻汉川信阳，洞庭湖内无敌舰发现”、“湘北洞庭湖全境安谧，鄂西随县京山有炮战”、“湘北炮战寇图窥新墙，鄂东我夹击收复罗田”、“鄂豫边连克英罗高璜，新墙河北举围歼顽敌”、“皖西豫东区大部收复，鄂南湘北敌纷向后撤”。从标题披露的战况来看，使人信心倍增。《浙西日报》的国内新闻以报道前线胜利战况为重点，该报1940年6月28日第1版，6篇消息均为胜利消息：“我再度攻入西山向南昌猛袭”、“我神鹰空军出动轰炸宜昌附近残敌”、“敌机又袭川境——我方空军猛烈进攻，击落敌机二架余皆狼狈逃去”、“宜兴敌会合伪军再犯南站潘庄——我军迎头痛击”、“鄂南湘北我军奋勇歼敌——袭崇阳羊楼司毙敌千余”、“地雷爆发，敌车炸毁”等。这些战事消息的刊发，为军事测评的科学预见提供了资料。羊枣许多的军事评论和预测，就建立在战事新闻的基础上并予以科学分析而得出的。《东南日报》还很注重用三行标题突出新闻内容，让人一看标题就一目了然，斗志倍增。

在采写战事新闻的记者中，范长江、石西民、曹聚仁等皆属采写战事新闻的高手。他们往往直接与战场接触，在前线的观察、采访中，用最快的速度向国人报告战事和与战争有关的事件。范长江深入台儿庄战场，采写的《台儿庄血战经过》《慰问台儿庄》《台儿庄血战的故事》和关于徐州战役的新闻通讯，经由东南报刊发表和转载后，获得极大的反响。范长江还与王坪、任重一起组成“东进支

队‘踏上湘、赣、浙的旅程，采写激发人心、令人振奋的战事消息，此举受到了正在金华视察工作的周恩来的高度赞许。石西民作为《新华日报》记者来到江西前线，深入军民团体，采访军界将领，在战壕中聆听士兵讲述的战争经历，将一腔热血凝于笔端，作《大战火烧山》《战地访李汉魂将军》《金轮峰歼敌记》《记九江姑塘战事》等东南战地新闻通讯，又与黄源一起赴新四军驻地，采写了《活跃在京芜的新四军》《江南游击横断面》等。这些战事报道，在《新华日报》及东南报刊上发表后引起强烈反响。曹聚仁曾在《东南日报》刊发二帧照片，一是日寇将中国同胞的头颅砍下用以展览，一是同胞头被砍下后日寇环立取乐。在血淋淋的照片旁，配以指向明确的口号：“我们想要停止敌人的疯狂行为，唯一的方法只有以武力答复武力”；达到了一般新闻报道难以企及的效果。

除却直接报道战场的战事新闻外，与战争攸切相关的社会政治新闻的采写也以时效性、鼓动性见长，这是战争新闻的一个重要层面。如政治新闻，除了介绍战时重大决策、会议等消息外，对投降卖国行径的报道也很及时，且抨击激烈，尤其是对汪精卫为代表的民族败类的附逆丑行的披露，自是战时新闻中的重要内容。各地报刊也纷纷报道各地民众的抗日救国斗争，介绍各个团体、阶层人们的抗日活动，这对鼓动全民族奋起抗战是极有激励作用的。

### 三 新闻在民主化进程中的正反效应

抗战中期，范长江等一批优秀新闻战士认为：“新闻业在战争年代是政治的工具，应在民意与政治之间充分发挥新闻的调节机制作用。”这样阐明战时新闻与民主政治之间的关系，无疑是鞭辟入里的。战时东南新闻业的蓬勃发展，一个重要的表现便是使新闻在推动民主化进程中充分发挥了“推进社会”的重要作用。东南

---

转引方蒙著：《范长江传》，中国新闻出版社 1989 年版。



地区的进步新闻工作者在坚持抗日的大前提下,不失时机地运用新闻武器为实现民主政治而展开不懈的斗争,为推进该地区的抗战建国事业作出应有的贡献。

中国的抗日战争,从本质上说是在统一战线旗帜下形成的民族自卫战争。在统一战线内部,在国内各政治力量之间,始终充满着民主与反民主的斗争。抗战开始后,中共与社会贤达提出的开放言论、集中人才、赦免政治犯等涉及民主化问题的建议大体上为当局所接纳,以往阻塞言路、滞塞信息的新闻封闭格局也有所打破。基于这个现实,东南新闻界就特别珍惜来之不易的民主政治局面,抗战伊始各报刊就宣布沟通民意、推动民主政治、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稳固等宗旨。如《浙江潮》在其创刊号上发表《本刊使命》,明确宣示该刊的使命在于“促进《浙江省战时政治纲领》的实现”,并表示该刊愿作为推进民主的代言人而“沟通政府与人民的感情与意见”。作为官方报刊,它从一开始便表现出如此的民主诚意,十分难得。《浙江省战时政治纲领》是一份参照中共《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而拟定的文件,民主化的倾向十分鲜明。《浙江潮》以促进这个纲领为办刊宗旨,对于推动抗战前期浙江民主政治的实现起过不小的作用。该刊多次发表共产党人邵荃麟、刘良模等宣传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文章,体现出民主色彩可见一斑。福建《老百姓》报,为中共人士所掌握,明确宣布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宣传抗日救亡为该报两大宗旨。福建的另一份官方报纸《民主报》,被称为“东南民主壁垒”,该报的总编辑颜学回声称:他办报的第一个目的,就是宣传抗战“民气”,争取抗战胜利。该报副刊《新语》主编董秋芳在创刊的“刊头话”里,开宗明义宣布两条:一条要求民主,一条培养青年,以求该刊“新鲜、活泼和真实”。这两份报纸在其后福建反民主政治势力抬头时,都遭到厄运。著名民主人士、救国会

---

叶康参:《民主报在永安》,载《抗日战争时期永安进步文化活动学术讨论会专辑》。

“七君子”之一的王造时，战时在江西吉安创办《前方日报》，被誉为“屹立前方，为民喉舌”。王造时直言办报宗旨：“我们报纸的立场，就是人民的立场，也就是老百姓的立场，我们要替老百姓讲话。”这张以代表民意著称的进步报纸在战时东南地区产生重大影响，也是因为以推进民主政治为宗旨而获得人民广泛信任。

在整个抗战期间的东南地区，以推进民主政治为己任的进步报刊和进步新闻工作者，总是勇敢地站在人民力量一边，为传达人民的呼声而仗义执言。他们敢于揭露战时种种弊端，积极干预政治，呼吁国内民主政治的实现，真正履行民众喉舌的使命。在这一方面，王造时以文化人极其强烈的参与意识，力倡民主和宪政，反对专制和独裁，表现最为出色。在短短几年时间里，他为《前方日报》撰写了60多篇论文和社论，始终坚持抗战和民主两大宗旨，表现了一个民主战士的可贵本色。《前方日报》刊文直斥时弊，揭露非民主化倾向，朝野为之震动。如《今日所应提倡的道德——正义、气节、廉洁》一文，要求做到“君子道长，小人道消，是非显明，正气乃彰”；《挥泪望中原》一文，主张“削富济贫”，使“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社会现象绝迹；在《挽转颓风》中提出均苦乐、平负担、进君子、退小人、明是非、辨曲直、惩贪污、办奸商、禁奢侈、行节约等。所论虽无明指，但皆是要求政府当局实行民主、廉洁政治的“诤言”。《前方日报》敢于为民请命，犯上直谏，没有一点为民主献身的精神是不易做到的。

许多在国民党官方报刊中任职的新闻工作者，尽可能捕捉时机为民呼号，同样表现了这种民主精神。1944年秋，发生在《赣南民国日报》的“开天窗”事件，即是一例。针对战乱期间赣州难民充塞道途，“新赣南”如“天堂”的宣传与事实不符的情况，该报编发了《幻想与现实》一文，刊登在显要地位，对赣南“新政”张扬过度提出

---

江林书：《屹立“前方”，为民喉舌——回忆王造时创办的《前方日报》》，载《新闻研究资料》总第37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3月出版。

批评。这本属新闻传媒为民立言之举,但报纸排出大样后,此文却被新闻检查处强行扣检。该报邹公托、罗继吾等正直新闻人士义愤填膺,毅然决定以“开天窗”出报,并在“开天窗”处加注一行:“本文经新闻检查室扣检”,以示抗议。此举后果当然可想而知:该报被宣布停报两天之处分,此事有关人员也被借故逐走。由于新闻工作者正直不阿,敢于为民请命,即使在国民党鼻子下的报刊也屡屡出现揭政府之丑事件。《赣南民国日报》曾捅出一桩南康县政府集体贪污案的丑闻,此事传播全国,弄得蒋经国都下不了台。泰和《捷报》公开发表文章批评省政府取消“平价米”的决定,为生活已陷于极度贫困的公教人员请命,使政府处于难堪境地,获得了社会的好评。即便像《前线日报》这样的战区机关报,也时有《官虎与商虎》一类杂文发表。虽然此类“新闻事件”只是在有限度的范围内发生,而且勇于揭丑的报人大抵都没有好的结果,但这种在官方报刊中敢于犯颜直谏,呼吁民主政治的新闻所起的作用却相当大。

新闻除对一般社会问题的揭露与针砭外,在重大政治斗争中,则起到了坚持团结、坚持抗战、坚持进步,维护与巩固抗战大局的作用。《浙江潮》在各个时期发表有坚持民主、坚持团结的言论,可推为代表。抗战伊始,统一战线刚刚建立,有人持怀疑观望态度,有人置身于抗战事外,阻碍了抗战热潮的形成。该刊即于第6期发表刘焕林的《摆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前面的三大心理障碍》一文,分析和批判了几种有碍统一战线工作的错误思想;第4期发表麦新的《有钱者不出钱》的言论,揭露战时乡村中“有力者出力,还要出钱;有钱者不出钱,还要捞钱”的不合理现象,对地方基层政权中宵小之徒提出尖锐批评。1938年底,反共顽固势力开始抬头,进步力量受到打击。该刊于第40期发表曾涛的《发扬“一二·九”、“一二·一六”的斗争精神》一文,以纪念两次学运为契机,回忆以往“安内攘外”政策造成的严重失误,批评了部分地方当局破坏青年救亡运动的不光彩行径。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国民党反共摩擦不断发生,统一战线的局面受到严峻考验,该刊更不遗余力吁请当局实行

政治民主,坚持团结抗战。如第86期发表恽逸群的《进入相持阶段之后》一文,指出在当时的形势下,“必须在政治上加倍的警惕,坚持团结,坚持抗战,实行民主政治”。第89期发表范长江的《记新都宪政座谈会》和张志让的《宪政运动与抗战建国》,都针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提出了强烈的实施民主政治的要求。第92期发表千家驹的《开除汪精卫党籍一周年》一文,更尖锐地指出:“我们内部是不是还存在一些偷偷摸摸破坏抗战破坏国内团结的分子……是不是还有许多人把对内看作重于对外,把战友当作敌人?”这类文章形成舆论力量在社会上发生了影响。在提倡民主和宪政,坚持进步,反对倒退方面,王造时主办的《前方日报》,在东南地区影响极大。仅仅关于宪政问题,王造时就撰写了《这是中国革命的历史任务——民主宪政》《宪政与人民的基本权利义务》《政治家与政客》《改革政治之道》《拥护赛恩士先生必须打倒赛先生的敌人》《成败关键在诚意》《还有四句话》《讲理不讲打,动口不动手》等一系列文章。在《还有一句话》一文中,主张“算大帐,莫算小帐;算外帐,莫算内帐;要远看,莫要近看;要前看,莫要后看”。其争民主,争宪政,倾向进步力量,维护抗战大局之心,已溢于言表。作为一个中间派民主人士,从新闻舆论的号召力说,在当时的形势下,这比共产党人所写的文章产生的影响还要大,因而尤为当局所头痛。此外,浙江的《民族日报》《浙西导报》,福建的《老百姓》报、《民主报》等,也都堪称鼓吹民主政治的急先锋,在民主与反民主斗争尖锐化时刻,都旗帜鲜明地发表过坚持团结与进步的文章。

需要指出的是,战时东南新闻界在提倡政治民主化问题上观点也不尽一致。报人站在不同的立场上,抱着不同的政治态度,对实现民主政治的看法也截然不同。一般来说,官方报刊秉承的是官方意志,维护一党专政的立场,在民主化进程中所产生的只能是负效应。战时东南地区国民党的《中央日报》及各省党部控制的报纸,如福建的《大成日报》浙江的《东南日报》江西的《民国日报》等,大都扮演了这样的角色。自然,这类报纸并非漆黑一团,报人中有

识之士也不少,他们为实现团结抗战的局面做了有益的工作。然而,当国共两党斗争激化时,这类报纸作为官方的喉舌,自然要同进步报刊、民主报刊处于尖锐的对立状态中。最典型的例子是《中央日报》(福建版)挑起的一场旨在扑杀《民主报》的论战。当抗战接近尾声,“两个中国”之命运决战在即,民主与反民主的斗争处于尖锐化时,《中央日报》始而于1944年冬挑起所谓白话文之争,连续发表题为《白话文危机》《从子曰到鲁迅说》《威尔基眼下的高尔基》等署名的星期论文,宣扬复古倒退,污蔑鲁迅、高尔基,批评革命文艺。当遭到《民主报》奋力反击后,继而将文艺斗争引向政治斗争,污蔑引用鲁迅、高尔基的言论是为共产党立言,“以小朝廷的地位自居”,要求对这些人“明正典刑”。接着,于1945年3月13、14两日,连续发表《肃清危害党国的毒瘤》《强化本党革命的堡垒》两篇社论,道是一批“反革命、假革命”正在“深入文化机关团体,滥用公私报纸、杂志发表谬论”,要求各级政府“拿出大刀阔斧的手段”,“把那些混进本党的首要奸伪分子一起赶掉”。在一片鼓噪声中,终于酿成了“永安大狱”,《民主报》的羊枣、董秋芳等进步新闻工作者首遭迫害,并祸及一大批追求进步、追求民主的新闻界人士。

#### 四 在艰难踟蹰中走向繁盛的出版业

战时东南出版业出现了异常繁盛的局面。可以说,这里是继武汉、桂林、重庆之后又一战时出版中心。这个中心的特点是:它以金华、丽水、南平、永安、上饶、赣州等文化活动地为据点,扩展到周围县份,形成纵横交错的出版网。据统计,战时浙江出书521种,出版社76家(众多个人出书机构不计在内),书店229家,杂志约420

种；福建仅永安一地，报纸、期刊 109 种，出版社 16 家；江西报刊至少在 166 种以上。这些出版物遍布浙、闽、赣三省各地市县，分属政府、军队、民间 3 个层次，涉及青年、妇女、学生、公务员、文化团体、艺术团体等各阶层，内容又可分综合类、政治类、经济类、文学类、艺术类、教育类等等，可谓品类齐全，分布面广。战时出版业呈如此繁盛局面，在该地区是史无前例的。

同战时东南新闻业克服因战争带来的艰难和在民主与反民主的激烈斗争中蹒跚行进一样，出版业也是在艰难胝蹶中求生存、谋发展。

战争的不断升级和沦陷区的日渐扩大，使出版活动在血与火的斗争中经受了严重的考验。有资料表明，由于日寇的长驱直入，中国的新闻出版业在短时间内蒙受了惨重的损失。据国民党中宣部和内政部统计，以 1937 年七七事变为界，此前全国出版报纸 1014 种，此后锐减 600 种之多，大量出版机构或压缩、或停顿，出版业一度出现寥落景象。但随着全民抗战高潮到来，文化出版事业受到高度重视，出版界经过短暂的心理、组织调整后，在“国民精神总动员”的号召下，在短时间内又呈发展趋势。出版业中兴的一个显著特点，便是它插进到“新生的地带和落后的穷乡僻壤”，在内地遍地开花。东南地区的出版繁盛局面便是在这种情势下形成的。

战时东南出版社中心最初在浙江金华，由于文化人的努力和当时政府的支持，在很短时间内就办起了十几家由政府、民间、个人创办的出版社和几十种报刊。全国有影响的国际新闻社，生活书店、新知书店等也纷纷来此开设分社、分店，形成了新闻、出版、发

---

详见《抗日战争时期浙江出版事业概况》，载《浙江出版史料》第 2 辑。详见《抗日战争时期在永安出版的报纸期刊辑览》，抗战时期永安进步文化活动学术讨论会材料之十六。

详见《旧中国江西报刊概述》，载《新闻研究资料》第 49 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0 年 3 月版。这个统计数字所涉“杂志”一项，仅为 1939 年、1940 年两年。

详见李龙牧著：《中国新闻事业史稿》，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5 年 1 月版。同上。

行品类齐全的文化出版网络结构。随着战火的不断蔓延,这类文化出版机构一再搬迁。金华沦陷以后,文化人又立即转移阵地,加入闽西、赣东南的文化出版行列,保持了东南地区文化事业的持续繁荣。在战时艰苦条件下,不少文化人以刻苦耐劳、报效国家的奉献精神,支撑着抗战文化出版事业,创造了光辉业绩。以永安的东南出版社为例,这家在东南地区乃至西南大后方都颇具影响的出版社,在短时间内出版近30种国内外名著,总数达六七万册,又经销了大量的进步书籍。然而,在创业艰难阶段,经营这家出版社的仅三四个人,经理李达仁一人身兼编辑、校对、发行、会计、出纳数职,可谓呕心沥血。在战时用纸紧张情况下,他们想方设法采用福建土造道林纸,这种纸光泽虽不如舶来品,而洁白则有过之,加以在印刷质量上下功夫,因而该社的出版物曾受到普遍赞誉。该社出版郭沫若的译著《浮士德》后,郭曾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长信给李达仁,称赞东南出版社工作认真。民间出版活动所显示的,同样是为抗战而献身的精神。《浙西导报》的前身是油印报纸《啸报》,它是几个年轻人凭借着一架油印机,在沪杭线硖石镇附近的一个村庄里诞生的。该地当时已是沦陷区,不仅物质生活异常艰苦,坚持办报宣传抗日还冒着生命危险。一位亲自参与其事的年轻人当时写道:他们过的是“最艰苦的流亡生活”,“敌人从一个村庄上来,我们就躲到另一个村庄上去,除了一般的民众工作外,我们就运用这架随身的武器(按:指油印机),每天出一次油印报”。

民众参与文化出版活动的热情与积极性,在当时特别受到进步力量的关注与支持。1938年4月,浙江奉化进步青年胡华克服种种困难,在中共地下党员帮助指导下创办了宣传抗日主张的方言通俗小报《战时大众》,其销售量甚至超过了官方的《奉化新闻》。胡华将每期小报寄往远在延安的毛泽东。7月,他接到毛泽东给

---

新东:《我们是敌后文化小分队——浙西导报是怎样产生的》,载《文化战士》第1卷第2期(1939年6月)。

“浙江奉化战时大众报社”的亲笔信，信中说：“收到贵报，你们用通俗的文字，向人民大众进行抗日救亡的宣传，这一工作很好。希望报纸由宣传工作，进而起到组织群众的作用。”

战时东南出版业是在进步力量同国民党反动派针锋相对的斗争中求得生存与发展的。抗战期间，民主与反民主的斗争始终十分尖锐、激烈，这同样也反映在文化出版事业中。国民党顽固势力为了钳制舆论，限制和摧残进步的出版业，曾在抗战期间多次颁布所谓图书审查方法之类专制性条例，在各地设有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可以任意删改原稿，或禁止出版。东南地区也不例外。该地由各省党部管辖的图书杂志审查处负责查禁图书的工作。据1938年5月至1945年8月国民政府查禁书刊目录，其中被江西、浙江、福建三省图书审查委员会（处）送审查禁的东南出版机构和在该地发行的书籍就有：《社会科学概论》（朗西）、《当代中国民族英雄传》（谭楞枷）、《夫人肖像》（董每戡）、《民主与文艺》《风尘》（聂绀弩、王西彦）、《战地歌声》（劫夫）、《松涛集》（石灵）、《莫斯科观感录》（陆宁甫）、《外人眼中的中日战争》（宾符）、《如何实践抗战建国纲领》（徐益）、《战时经济问题与经济政策》（王亚南）、《帕米尔高原的流脉》（杨朔）、《红的天使》（叶灵凤）、《三年后之中国》（挽沉）、《路》（茅盾）、《长城察北的抗战》（辛质）、《民权与革命》（傅于琛）、《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何干之）、《抗战总动员》（邹韬奋）、《两个女性》（华汉）、《第八路军将领小史》（史天行）、《丁玲——新中国的女战士》（叶舟）、《陕北印象记》（李黎初）、《最活跃的抗战游击队》（毛泽东等）、《萌芽》（巴金）、《资本主义是什么》（杨荣国）、《社会进化思潮》（邓初民）、《西线随征记》（舒群）等100余种。这些出版物分别以“鼓吹偏激思想”、“诋毁政府”、“颂扬红军”、“曲解三民主义”、“以派系私利为立场，妨害民族利益”等种种理由而遭查禁。

---

《毛泽东同志关怀奉化 战时大众报》载《浙江出版史料》第6辑。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政府查禁书刊目录（三）》，载《浙江出版史料》第6辑。



然而,东南地区的出版工作者并没有屈服于淫威,他们采用种种方式同文化专制主义作斗争。如改进出版社的几个期刊,在遭审查删削或整篇文章被抽掉后,常常采用“空白式”并径直排上“缓登”二字以示抗议。金华生活书店及新知书店,常常将“禁书”通过秘密渠道发行。许多出版社在书稿被禁后,改换方式继续出版同类书籍。如王亚南的部分经济论著被查禁,但东南出版社、经济科学出版社仍继续出版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著作。报人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获得的是战时东南出版业的持续繁盛,同时也为后世保存大量弥足珍贵的文化成果。

#### 附录:战时东南出版机构和主要出版物

**改进出版社:**是由国民党福建省政府出资创办的官方出版社,于1919年初在永安问世。左翼作家黎烈文经福建省政府教育厅长郑真文推荐,受省主席陈仪之命组建该社,就任社长兼发行人。该社以“推动战时文化事业”为宗旨,发扬鲁迅“推重车上峻坡”的精神,在共产党人的支持下,先后编印《改进》(黎烈文、沈炼之主编)、《现代青年》(卢茅居、赵家欣等主编)、《现代儿童》(葛琴、许粤华等主编)、《战时民众》(姚勇来主编)、《战时木刻画报》(江则明、萨一佛主编)、《现代文艺》(王西彦、章靳以主编)等6种固定期刊。出版《改进文库》《现代文艺丛刊》《世界大思想家丛书》《现代青年丛刊》《现代儿童丛书》《世界名著译丛》《建设丛刊》等丛书。王亚南的《中国经济思想评论》邵荃麟的《麒麟寨》唐 的《劳薪辑》章靳以的《鸟树小集》许大虹的《希特勒和国社党》王西彦的《报复》等名著收入这些丛书。该社一年行销本社图书杂志有37.7万册,外社图书杂志3.88万册,省内设有3个营业点,3个经销处,省外往来同行业有300余家。改进社的编辑队伍强大,作家阵容

---

数字统计源自中共永安市委党史研究室1991年编印:《抗日战争时期永安进步文化陈列室解说词》。

中日关系百余年的历史,前 50 年,是日本帝国主义不断侵略中国的历史。1945 年 8 月日本战败投降后的 50 余年,则是不断进行翻案的 50 余年。日本右翼分子和军国主义残渣余孽一次又一次地修改教科书,一次又一次地否认南京大屠杀,一次又一次地要求修改战后和平宪法,不认输,不认罪,不赔款,翻案愈演愈烈。翻侵略历史的案,究竟是为了什么?翻案是为了正名,正名是为了仍操故技、东山再起,是为了复兴军国主义,再开拓“万里波涛”、“万里海疆”。中日关系百年,风风雨雨,就日本右翼势力而言,真是万变不离其宗,即侵略二字。今天,他们已强占了我国的固有领土钓鱼岛,明天将会再干什么,我们要拭目以待。日本的绝大多数人民是要和平的,许多日本友好人士为中日友好,奉献了毕生精力,中国人民永远怀念和感谢他们。现在中日两国人民必须携起手来,坚决制止日本右派势力复活军国主义的一切倒行逆施,巩固和发展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事业。

### 死灰复燃,警钟长鸣!

章伯锋

今年 5 月,在日本上映的片名为《自尊——命运的瞬间》的电影,是一部为战争罪犯东条英机鸣冤叫屈,为日本军国主义招魂的影片。它的出笼绝非偶然,影片制作者毫不掩饰地说,“我们要利用电影来找回日本人值得骄傲的那一段历史”。自 70 年代以来,日本右翼势力一次又一次地跳出来,通过修改教科书篡改历史;著书出版否认南京大屠杀的罪行;日本内阁成员几乎年年都有人公开参拜靖国神社,以表明自己坚持皇国史观的政治立场。而当世界各国人民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50 周年之际,日本国会围绕“反战议案”发生激烈争论,部分国会议员成立联盟,反对通过此案。他们歪曲历史,掩盖真相,否定侵略战争性质的言行与事件层出不穷。这些动向均说明日本旧势力不满足于现状,准备有朝一日重走老路